

商周至汉初

SHANGZHOU ZHI HANCHU
MINZU WENHUA QUYU HUDONG YANJIU

民族文化区域互动研究

曾文芳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商周至汉初

SHANGZHOU ZHI HANCHU
MINZU WENHUA QUYU HUDONG YANJIU

民族文化区域互动研究

曾文芳 /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郑牧野

封面设计：肖 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商周至汉初民族文化区域互动研究 / 曾文芳 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9

ISBN 978-7-01-016742-8

I. ①商… II. ①曾… III. ①民族文化—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K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26676 号

商周至汉初民族文化区域互动研究

SHANGZHOU ZHI HANCHU MINZU WENHUA QUYU HUDONG YANJIU

曾文芳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龙之冉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26.25

字数：390 千字

ISBN 978-7-01-016742-8 定价：5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 言

文化是民族的根和魂，而民族是文化的载体和动力。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定文化，其文化史就是民族史。中华文化五千年，生长于领域广大、地形开阔、气候繁复的空间环境，发萌源远流长，过程蜿蜒曲折，正如两条母亲河——长江与黄河一路浩荡，途中不断汇入大大小小的支流，变得越来越丰富多姿、气象万千，涵养出了独特的文化气质，最后汇入了世界文化的浩瀚海洋。中华民族五千年，在亚细亚农业文明的雄厚根基上滋生繁衍，虽历经消长变迁、分分合合，却始终绵延不绝，竟如滚雪球般凝聚壮大，成为今天世界上人数最为壮阔的一支民族共同体。回瞻民族历史舞台，每一支族体都曾经担当了创造文化、发展文化和传承文化的责任和使命，扮演过不可抹灭的文化角色。

文化是一个不断进行物质交换、能量转化和信息传递的动态开放系统，它只能在不断实现自我保持与自我更新中求得延续。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和民族都是通过长期持续的交流互动而持续获得强大的生命力与凝聚力，并在旺盛而良性的生命机制运行中不断丰富和壮大的。中华文化还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生命系统，其发展历程中异质文化间的交流互动始终扮演着驱动发展的核心作用。这种交流，既有来自外部的不同文化系统间的相互浸润汲取，也有文化系统内部不同文化类型的彼此相融相长，并延续性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高峰迭起的发展序列。纵观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演进，其频繁而密切的开放式交流互动，使文化的内涵既恢弘博大又精微深邃，使民族的成分既丰富多元又血乳交融。这一点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全面梳理和深入思考。



商周至汉初正处于中华传统文化发展的轴心时代,这期间缔造了最为璀璨的文明根基;商周至汉初亦正处于中国古代民族交流和融合最为频繁的鼎盛时期,从而建构了中华民族最核心的主体民族——汉族。我们研究和思考这一千多年间的民族文化互动交融之状况,对于更好地理解中华文化系统的创造性内涵与特征,把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统一与多元性发展规律,从中获得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凝聚团结各民族、构建精神家园具有极为特殊而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在梳理与研究过程中,需要运用足够充分的考古与文献资料,以理性的文化思维、求真务实的科学考证、彼此联系的方法立场做出更为严谨的重新序列与判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文化与民族的觉醒源于对自身历史的系统认知、理性尊重和科学传承。考古学有充足论据证明中华文化的源头本是满天星斗式的多元迸发,并广泛散布于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从最初的多个文化中心,逐渐形成以华夏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格局。中华民族的源头也必然多元并存,生活足迹遍及祖国各地,后来逐渐凝聚为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多元分布格局,正所谓“华夏民族,非一族所成。太古以来,诸族错居,接触交通,各去小异而大同,渐化合已成一族之形,后世所谓诸夏是也”^①。可见,文化与民族要发展,都必须具有强大的开放、包容与多元性,从而证明了“文化越灿烂,民族的血统似乎越复杂”^②的发展规律,只有坚持了平等交流、共生共存的发展理念,才能够不断吸收新鲜的血液,茁壮成长,绵延壮大。这些历史经验,无疑将会为今天的民族发展、文化繁荣提供启思性的理论滋养和自信坚实的精神支撑。

述往思来。当今时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竞争与合作复杂并存,中华文化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古今之辨”、“中外之辨”的双重挑战,甚至在世界文化的大熔炉中可能面临民族主流文化绝断的危局。而这种危局,亦同样存在于世界许多民族国家中。如何寻求世界各族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11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28页。

② 岑仲勉:《西周社会制度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1页。



各文化的共生共融共发展,加强彼此的健康良性互动,有效化解恶性冲突竞争,成为全球化时代不可避免的话题。同时,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需要顽强地摸索重新崛起的路径,迸发新的活力,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它的现代化既不能是全盘西化的整体移植,也不能是传统文化的机械性沿袭,而是继承了传统、吸收了新学后的再造与新生。这一过程将更大程度地打破固有的封闭状态,通古今之变,通中西之变,融新时代波澜壮阔的际会风云于一体,体现出世界性与民族性的高度统一。习总书记2013年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时,首次向世界提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呼吁,并逐步丰富、完善为具有今天深远影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世界观。相信中国的多元文化传统和多民族共同体的发展经验,一定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积极有益的借鉴。我们热切期待着,世界文化、世界民族体的发展只要坚持多样性的统一,一定能够共同缔造和平发展局面和文化的高度繁荣!

目 录

绪 论	1
一、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文化圈的形成.....	1
二、区域文化的概念、内涵及划分的主要标准	6
三、民族、氏族、族群等概念认识及与区域文化之关系	13
四、商代以前民族文化区域的形成、发展与初期互动	26
第一章 考古所见商代方国联盟时期的民族文化区域性互动.....	62
一、商代早期民族文化间的区域性交流互动	62
二、商代中期民族文化间的区域性交流互动	80
三、商代晚期民族文化间的区域性交流互动	90
第二章 西周礼乐文明时期的民族文化区域性互动.....	141
一、周族的起源、发展及周初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	141
二、西周中期各民族文化间的区域性交流互动	177
三、西周晚期各民族文化间的区域性交流互动	189



第三章 春秋诸子争鸣时期的民族文化区域性互动	197
一、春秋早期各民族文化的重新分布与整合	198
二、诸子早期文化观的争鸣与区域性交流互动	233
三、五霸继起与各区域文化间的活跃互动	256
第四章 民族一统战争时期的区域会通与文化大一统	293
一、战国早中期七雄争霸与各民族文化的整合互动	294
二、“华夏一统”进程中诸子文化观的交锋与逐渐合流	320
三、战国后期杂家《吕氏春秋》对区域文化的会通与文化系统 的重构	325
第五章 秦至汉初中央集权的制度建立与政治大一统	363
一、秦代的“大一统”措施与各区域文化间的交流互动	364
二、“汉承秦制”的集权巩固与各区域文化间的交流互动	390
三、中国政治大一统格局的确立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养成	394
第六章 商周至汉初民族文化区域性互动的路径与特征	400
一、商周至汉初民族文化区域性互动的基本路径	400
二、商周至汉初民族文化区域性互动的基本特征	406
后 记	410

绪 论

对每一个民族国家而言,它们的历史都是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中国历史是研究中国文化源流、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和中华人文精神凝聚的核心依据。当今世界,民族文化千姿百态,人文精神风貌各异。追根溯源,其文化、其民族都有自身发展的独有轨迹,呈现出独有的发展规律,塑造了独有的文化类型,形成了独有的民族气质。

中华文化体系伴随着中国历史的演进,萌芽并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洗礼,形成了今天迥异于世界其他任何一种类型的、独特的文化系统;中华民族共同体同样伴随着中国历史的连续性演进,在与华夏文明推进过程的相互作用下像滚雪球一般逐渐凝聚和壮大,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

商周至汉初是我国传统文化奠基、汉民族形成、中华民族精神养成的关键时期。重新考察这一长达近两千年的民族文化之交流与互动,我们将不难找出中国政治大一统格局的形成与中华民族精神养成之历史根源与核心动力,即:民族文化始终在不间断地、持续性交流互动。

一、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文化圈的形成

(一) 中华文明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我国多个区域

“考古表明,中国既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一个原始文化体系最为庞大和丰富的国家,还是世界上唯一的能够提供人类起源的连续性文化证



据和拥有多个原始文化起源中心的国度”。^①毋庸置疑,我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具有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区域之一,与西亚、中美洲等地区是举世公认的世界农业的主要起源地。农业是一切文明的起点和基础^②,正是农业文明的出现和飞速发展孕育了宏大丰富的人类文明,中华文明正是其中最为璀璨、绵延最久的一支。

我国学界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初始于20世纪20年代,正值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当时主要针对“中华文明西来说”的诸多争论而产生^③。后因考古学在中国的传播和飞速发展而日渐深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此项研究进入了全面开展期,其成果不但有徐旭生、夏鼐、苏秉琦、严文明、李学勤等大批学者们的扎实推进而百花齐放,而且还有国家科技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④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⑤的同步实施,对文明探源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给予了较为丰富的思索和讨论。

持有中华文明起源于华夏“本土说”观点的学者们认为,这一起点可上溯至我国新石器时代,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苏秉琦和严文明两位专家。苏秉琦提出了“满天星斗”的“文化谱系研究法”和“起源多元”学说,他把中国考古文化依据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分为六大区域,用考古学方法来实证中华文明起源的多源性,即“三部曲和三模式是中国万年以来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古代国家形成的一个系统完整的概念,也是试对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文明起源讨论进行的一次总结”^⑥。严文

① 李少林主编:《中国文化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② 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文化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③ 王东平:《中华文明起源和民族问题的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22页。

④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以研究夏商周历史时期为项目的多学科系统工程,由国家科委等7个单位联合组成。正式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并于2000年9月15日通过国家验收。

⑤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由中国科技部启动于2001年,包含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历史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的数十位学者参与。

⑥ 苏秉琦:《中华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05、130页。



明则进一步提出了“重瓣花朵”式的“多元一统说”^①，认为“比较早的起源的地方，我们所知道的大概是这几个地区：一是中原文化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等地区，这些地区比较发达的是仰韶文化；二是山东地区，比较发达的文化是大汶口文化；三是江浙地区，比较发达的文化是良渚文化；四是长江中游地区，比较发达的文化称为大溪文化，以及在它之前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五是燕辽地区，比较发达的是红山文化。此后巴蜀、甘青等地也出现了较发达的文化区”^②。学界围绕这两个观点引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开创性地建立起了我国考古学文化的谱系，并促使更多的学者展开了对中华文明多起源和新石器时代不同文化区域特色的深入研究，不断涌现出新的见解，如陈旭的“多元与有中心论”^③，葛剑雄对“多源”与“一体”的会通^④，等等。在不断深入探讨与丰富理论思考的同时，“中华文化本土说”的观点逐渐成为我国学界的较普遍共识。

中国文化是土生土长的文明。它扎根于拥有广大平原沃野、农业文明极为发达的中原地区；它不是一个单一文化体，而是一个文化复合体，通过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各种文化长期、不间断的相互交流、相互吸收、相互联结，最后才形成了今天内涵极其丰富多样的中华文化系统，而其文化的多元复合性特点早在文明起源之初就已经通过历史的演进过程充分地表达出来。正如李伯谦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是一个漫长的逐步的中间未曾间断的独立演进的过程，是幅员辽阔的中国大地上以黄河流域、长城地带和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各个地区古文化共同发展融合的结果”^⑤。中华文明起源之后又走出了一条完全独特的历史发展

①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第7页。

② 严文明：《中华文明起源》，《第五届红山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2010年版，第2页。

③ 陈旭：《中国文明起源的多元论与有中心论》，《洛阳考古四十年》，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5页。

④ 葛剑雄：《中华文明：“多源”与“一元”并不矛盾》，《文汇报》2001年12月1日第11版。

⑤ <http://www.pku.edu.cn/academic/archaeology/center/structure/main-3/k/1.html> 2-5-14，转引自王东平《中华文明起源和民族问题的论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之路,区别于其他任何地区、任何文明模式。因而,我国学界关于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理论架构也早已不再对西方学说理论进行生搬硬套,最终以焕然一新的文化自信形成了自有的关于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的学术体系^①。

(二) 中华早期文化圈的形成与特征

文化圈的内涵特征往往从其中留存的人类活动遗迹得以体现。考古发现,中国境内广泛分布着早期人类的活动遗迹。旧石器时代的直立人、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阶段在我国境内都有文化遗物。直立人分别有位于长江流域的云南元谋人、黄河流域的陕西蓝田人,以及长城地带的北京人等;早期智人的分布更加广泛,如山西汾河流域的丁村人、许家窑人,东北地区的喀左鸽子洞人,南方地区的长阳人、桐梓人、马坝人等;晚期智人的活动地点至今亦已发现数百处,遍及我国 20 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考古学者对延续长达 200 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人类遗迹进行分析,发现它们已初步具有了早期区域性文化的特征^②。

至新石器时代,多个文化系统已陆续出现。其分布格局,严文明把它描述为“一个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圈层结构开始出现。这就是早期中国文化圈的萌芽”^③。关于这个早期文化圈的发展格局,观点不一,苏秉琦、张光直^④认为各文化区间平行发展、相互作用,严文明认为其格局有主有次,花心在中原,重瓣是与中原有亲疏差等、分层联系的周围文化(见前引)。

① 方光华、兰梁斌:《侯外庐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之研究》,《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1期,第50页。

② 王冠英:《中国文化通史(先秦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③ 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严文明作序”。

④ 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第6页。



中国早期文化圈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它经过了 200 多万年旧石器时代的发萌,从直立人、智人,到新人,经过若干阶段的缓慢递升,而新石器时代成为一个重要的承上启下阶段。今天,我们通过考古类型学、考古地层学和考古学文化的诸多资料足以证明:公元前 6000 年代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至公元前 4000 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早期文化的发展形态上已经具备了秦汉以后中国文化格局的基本雏形,是中华文化的原生文明。

中国早期文化圈的形成是长期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从已发掘的新石器时代各文化系统中人类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器物特征看,文化间交流互动始终频繁而活跃。如华南和长江下游均流行打制砾石石器,黄河中下游和华北地区常见细石器,而在华北、东北和长江下游等地均发现了同样特征的石斧、石锛和石凿等,“使用的石器具有同一性。很多史前遗址均使用了磨制的石器。其中,研磨谷物外壳的石磨盘、石磨棒惊人地一致。兴隆洼文化(前红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前仰韶文化)和河北磁山文化(前仰韶文化另一类型)出土了大量的石磨盘、石磨棒”^①。这些有着共同器物特征和生产方式的文化系统,有的区域相邻,有的彼此空间距离却很远,究竟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还需深入探究,但至少说明了我国早期文化圈内部各文化因素间从未断绝彼此的深度影响。

中国早期文化圈的形成同时也勾勒了古代民族形成的历史脉络。从旧石器时代开始,我国生活的古人类就表现出不同地域内的不同人种特征。通过对早期智人类型的大荔人、马坝人、丁村人的人类化石分析,就已明显出现与世界其他地区不同的人种特征,如铲形门齿、印加骨、矢状脊,高颧骨、低鼻骨、宽脸颊等后世蒙古人种的体质特点,与欧洲、西亚等地的尼安德特人有着显著差异^②。而这些特征承继、发展到了新石器时代,在不同的文化区系还出现了各区系间细微的人种差异化发展,吴新智等认为这可能

① 雷广臻:《中华文明在不同区域起源的文化同一性》,《光明日报》2009年6月23日第12版。

② 王幼平:《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



- 6 是人群基因和文化存在交流的结果,是一种“连续进化附带杂交”模式^①。这也证实了中国早期文化圈的形成与古代民族的形成是双轨并行的。正如陈连开所论:“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起源,具有鲜明的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的发展特点……考古学昭示,在青铜起源与文明初曙时期,燕山南北、黄河上游、长江中、下游本来是与中原齐头并进的,有的甚至走在中原的前面。正是在这些四面八方的先进文化汇聚于中原、各部落集团融合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夏人、商人、周人,先后建立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复经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形成了稳定发展的华夏民族。”^②

二、区域文化的概念、内涵及划分的主要标准

(一)“文化”的内涵与特性

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文化”一词,系近代由西方词语转译而入中国,由之所引起的关于“文化”内涵的概念讨论也并之而来,至今争论纷纭。据计,世界各地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的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的解释和定义,竟已达数百种之多,可谓见仁见智,难以一统。本著在此不一一赘述和展开更深入的讨论,只取适合于自身需要之角度进行简单分析和定位。

简言之,文化是人类在历史发展中适应自然、改造自然所创造的成果,它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宽泛驳杂,亦绝非一国一族所独有。我国古人对其观察和思考最早之论述可见于《易经·系辞》,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将“文”分为“天文”与“人文”。所谓“人文”,“物相杂谓之文”,“谓之人群相处种种复杂的形相”,可用其专指社会制度、文明道德、伦常秩序等;所谓“化”,“惟其人群乃由不同种类相杂而成,于是

① 吴新智:《从中国晚期智人颅牙特征看中国现代人起源》,《中国文物报》2011年1月21日第5版。

② 陈连开:《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第23—33页。



乃求相和相通,乃有所谓‘化’”^①。在我国,西汉时期的刘向在《说苑》中才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文化”一词,谓:“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时指之“文化”乃是与武力相对的“教化”之意。

我们今天对于文化的理解与古代相比多有变化。一般说来,若从广义的角度,大多主张把人类创造的一切成果,即“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总和”均视为文化的研究对象,即“一个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及其价值系统”^②,若从狭义层面讲,则特指“精神文化的范畴”。因此,《辞海》的定义就包含了这两方面,即“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综言之,文化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区域的群体在其历史的发展中自觉与不自觉地所选取的有利于该民族或该群体生存、繁盛的物质与精神的生活方式,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等不同形式”^③。

文化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其时代性反映了文化发展演进中的历史时间向度,即文化总是与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和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相联系;其民族性反映了不同民族在实践活动中传承积淀而成的文化类型和精神特质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其地域性反映的是文化在不同的自然地理空间和社会人文空间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特征,它不是封闭而是有交流的,甚至亦可以是有条件地转换的。中国的文化是在中国地域范围内、经上万年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渐凝聚形成,它是中华民族的标志,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独有的内在特质。

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它表明:在特定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下,文化会逐渐凝聚、形成某一特定类型的文化传统和内容体系,沉淀、固化于不同地域人们的头脑中,并反作用于对应文化民族的发展,在一定的民族群体中

① 钱穆:《民族与文化》,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② 顾伟列:《中国文化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③ 朱恒夫:《中国文化史教程》,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2页。



形成特定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念,培养出深层次的文化心理结构,积累坚固的稳定性和强大的渗透力,从而赋予某一民族的人们特殊的精神风貌和文化气质,并进而对其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①。任何一个长期延续并能广泛传播的文化传统都是在时间上的纵向伸展和空间上的横向分布基础上得以不断发展并丰富起来,成为长期维系该民族存在的精神纽带。

中国文化具有多元化和一核心性。中国文化是世界几大原生文化之一^②,中国也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达五千年之久,并以其悠久的历史沉淀和丰富博大的文化内涵不可置辩地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最为鲜明、独特、庞大的文化系统。文化的核心是价值理念,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其核心在当今时代就表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源于传统、创新于时代,它与我国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并无根本冲突。一方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越大,则社会思潮的多元化越能健康有序地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思潮多元化有利于检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民中的认知程度,从而更加有效地发挥思想的引领作用^③。总之,经过努力,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将作为国家文化的软实力象征,成为凝聚人民共同利益和价值的思想源泉,并深刻影响和塑造我国人民新时代的价值理念、精神风貌和行为规范。

(二) 区域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区域文化,又称为“地域文化”,它是在一定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下形成的文化,“是一个地理的领域,在那个领域内的文化,在某些有意义的方面有趋于相同的倾向”^④。就学科而言,是专门研究人类文化在空间组合上的

① 宋桂祝:《关于东北地区区域文化的思考》,《中共长春市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5期,第30页。

② 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

③ 张岂之:《从黄帝陵到价值观》,《陕西党校报》2015年3月30日第3版。

④ E.L.Hoebel, *Anthropology*. 3rd.ed., New York Publish, 1966, p.561.



人文学科,它以广义的“文化”领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探讨在自然环境之中的人类活动形态,文化区域内的地理环境、特征,以及各种文化间存在的复杂关系,甚至也会包括文化传播的路径和走向,以及区域内人类的行为系统,包括社会组织、民俗传统、宗教信仰、经济体系、文学艺术等。

我国区域文化的观念早在古代就已经形成,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追溯源流、察其流变,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进行了分析和论述^①。而我国也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形成了特色较为鲜明的区域文化类型,考古学界根据考古发掘的器物特征和器物组合关系的变化来把握相对年代和空间分布形态,进行了类型划分,其结果和我国民族学界关于古代民族分布的理论形成了相互印证,即所谓华夏与“四夷”的五方格局。

区域文化产生的因素很多。既有地理环境、移民、政治权力和行政区划等因素,也有民族、宗教以及外来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它是在一定空间区域长期的发展中,融合了多种因素,逐渐积淀、提炼而成。既内化在区域群体的思想和行为方式里,又物化在区域的规章制度、产品和建筑上,因此,其特征广泛表现在方言、饮食、民居、婚丧节庆、民间信仰等诸多方面。由于区域文化一定阶段内还具有较强的稳定性^②,所以最能够集中体现一个空间范围内有特点的文化类型^③。

中华地理辽阔,地域差异性较大,族群众多,决定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多样化绽放,也是中华文化有机整体或大系统下的亚文化或子系统,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得以不断塑造培育的不竭源泉”^④。中华文化的核心最初起源、发祥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包括了今天陕西、河南、山西、河北等广阔的中原地区,成为中华文化的主干和根源文化,后来则广泛传播于周边及其他地区,通过夏、商、周等政权的扩张过程,发挥出强大的凝聚

① 段闪闪、李鹏:《〈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地域文化观》,《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第157页。

② 双传学:《区域文化刍议》,《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第190页。

③ 葛剑雄:《中国的地域文化》,《贵州文史丛刊》2012年第2期,第7页。

④ 中华文化学院编:《区域文化与中华文化》,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